

张闻天自传^①

(1929 年 4 月 29 日)

我于 1901 年（原文如此——编者注）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张村，一个中农家庭。我随父母在地里干活，同时在农村学校里勉强读书。1911 年革命后，我被送到南汇县高级学校学习。毕业后我在上海附近的一所技术学校继续学习。在这所技术学校还没有毕业，我就到南京一所高级技术学校学习，希望以后当一名工程师。

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中国爆发了以 1919 年 5 月 4 日学生运动闻名的反日运动。这一运动唤醒了包括我在内的千万青年对新生活 and 西欧“文明”的向往。我全身心地参加这一运动，对现存秩序感到不满，渴望实现当时在我面前被描画得迷茫飘渺而理想化的新制度，终于放弃了学习，不顾父母和整个我们的家族的反对，结果我同家庭断绝了关系。

在这一时期我开始在杂志报纸上写些短小的札记和小说，以此勉强维持生计。作为那个时期的“启蒙者”，我被安排在一家图书公司 Книжное общество 任“新文化”部的编辑。我在此时肤浅地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认识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数很少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由于对共产党的作用认识不够，对苏联的了解不够，我那时只是一个同情者。

这是张闻天 1929 年 4 月 29 日交给红色教授学院的一份自传，全文为俄文，共三页。原件存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 5284 目录 1，卷宗 464。

我这样工作了两年。后来在美国的朋友们建议我去他们那里，我在旧金山呆了一年半。我一方面在美国一家中文日报任编辑，并向中国发通讯，另方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上学。由于我工作的那家中文报纸编辑部很穷，常常不能保证发工资，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在一家美国餐馆洗盘子。我那时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研究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因为我很想表现中国人民的苦难。

资产阶级的美国没有使我满足。我追求更美好的事物。我想念祖国，回到了中国。我虽然有时在中学当教员，但基本上作为革命文学家工作的。我 1924 年在四川一所中学当教员，由于我对现存秩序的尖锐批评，地方当局把我和两名著名共产党员一起驱逐出四川。

我根据亲身的斗争经验深信，只有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起，我们才能在中国推翻这一秩序并最终消灭人剥削人现象。1925 年初回到上海以后，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来莫斯科以前，我作为鼓动员参加党的工作。

我来到这里由中国共产党派遣是在 1925 年底。我一直做翻译工作 同时在大学里学习。结束课程以后 我在教员班学了一年，同时在一二年级讲授联共（布）党史。到红色教授学院当旁听生后 我还在工人班讲授并现在还在讲授政治课。

至于党的工作，则我曾于 1926 年任支部局候补委员 Кандидатор бюро ячейки，1926 年和 1927 年任宣传鼓动委员会委员 член агитпропа，1928 年任党的助理指导员 现在任党的指导员 等等。从 1928 年 6 月起是联共（布）党员。

张 闻 天

1929 年 4 月 29 日

回忆彭真主持六届全国人大工作

张 承 先

我是作为山东省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

第六届全国人大，在彭真委员长主持下，在开展人大工作方面，我有三点深刻的印象。

一是维护新宪法的尊严，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新宪法，彭真主持六届全国人大工作时，强调新宪法必须成为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以及每一个公民的根本行动准则。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义务。他不只一次地讲，必须遵守新宪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说：几十年来，我们从革命战争时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时主要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掌握全国政权后，既要依靠政策，还要依靠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管理国家这样的转变。3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关系到我国安定团结、长治久安，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克服各种困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是强调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国人大工作是

在最重要的第一线工作，不断批评当时流行的某些错误说法和错误看法。当时有个相当流行的顺口溜：“老干部不要怕，不是政协就是人大”。确实有不少人认为到人大工作是“退居二线”。这种错误的看法违背宪法，极不利于人大工作的开展。彭真反复强调、明确指出，在人大工作是在第一线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线工作。决不能辜负人民的希望和重托。

三是在人大工作必须认真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权。他不断强调在人大工作“既不能失职，也不要越权”。强调不能失职就是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必须履行宪法所给予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搞好立法和执法监督。所谓不能越权就是人大和它的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要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决定，要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在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审议重大事项、监督政府的工作，但不应代替或者不恰当地干涉行政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彭真多次座谈研究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建设，他谆谆告诫我们这些从行政部门转到人大常委工作的同志说：“你们中有很多老部长，在行政机关工作和在人大工作有很大的不同，行政机关是部长负责制，人大是集体决定问题，集体行使职权，我委员长也只有一票权。”

彭真的这些讲话使我深受教育，提高了我对人大工作的认识，增强了责任感，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在人大工作。

六届人大在彭真主持下，健全了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民族、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 6 个专门委员会。6 个专门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大会议闭幕期间，经常工作在人大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由副委员长分别兼任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就使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得以有效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加强和充实了全国人大和它的

常委会的经常工作，使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工作逐步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六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周谷城兼任主任委员，我是常务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彭真委员长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周谷城主任直接领导下，加强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方面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这届教、科、文、卫委员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实施过程中，制定义务教育法提上了议程。六届全国人大开始工作不久，许多人大代表、部分人大常委会分别提出制定义务教育法的议案。由于各方面对实行义务教育是否已经具备了条件认识不一致，对制定义务教育法迟迟不能取得一致看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和教育部考虑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提出尽快起草制定义务教育法。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强基础教育，有步骤地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彭真认真贯彻中央决定，积极支持教科文卫委员会协同教育部进行义务教育法的起草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提出了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草案，并将草案印发到全国各省、市、区讨论。教科文卫委员会并分别到若干省、市、区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将经过讨论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人大常委会决定提交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义务教育法是发展基础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全民素质的迫切需要。义务教育法草案规定：国家实行9年义务教育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和实现9年义务教育制的期限。国家采取措施保证适龄儿童入学。

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积极帮助经济困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义务教育。

1986年4月2日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彭真对此非常重视。他在1986年4月18日委员长会议上就关于如何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先读了一段《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然后说：“回顾一下历史经验有好处从1906年清朝政府就提出《强迫教育章程》，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提出普及教育或义务教育，都成为官样文章。它们是反动的腐朽的政府，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打倒了敌人取得了政权情况就不同了。人民掌握了政权后抓什么？两件大事，一是生产、一是教育。这两件事抓不好搞什么四化是化不了的抓生产很重要生产搞不好不行，不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是空话！我们提倡艰苦奋斗搞好生产。在抓生产的同时，还有一条就是抓教育。列宁有句话，大意是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不搞好教育，文盲那么多，怎么搞四化？生产和教育是两项最基本的工作！”

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经全国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颁布了。法有了就要认真抓落实不说空话，要实打实，一定要认真抓上去。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议会大厦的建设可以缓办可大可小。能源、交通、原材料必须搞义务教育也必须搞。搞普及义务教育不是挤大专院校，大专院校也有困难。要在别的方面挤钱搞普及义务教育。大专院校是搞提高的，没有提高四化也搞不成——孤零零地办大学也不行。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很大而钱很少，不解决会不会也有使义务教育法落空的危险？！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要中央和地方共同下决心，一个是中央下大决心，一个是地方下大决心。不要看不起地方，不把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行！地方财力相当大，中央和地

方各占一半。有些地方学校有危房 群众开个会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就解决了。总之 义务教育法通过了 就要抓落实,一定要抓好。”根据彭真的讲话,委员长会议作出了宣传学习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决定。

根据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人大办公厅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参加,并通知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参加 组成大型工作团 分别到发达、中间、落后 3 类地区开展对义务教育法的宣传与组织实施的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对发达(江苏省)中间(湖南省)落后(四川省)3 类不同地区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些地方办学条件很差 许多地方是“黑屋子 土台子 有雨变成泥孩子”,存在大量危房,每年都有危房倒塌砸死教师和学生的事件发生。1980 年因危房倒塌而伤亡师生 921 人 其中死亡 62 人 重伤 305 人。除办学条件差外,合格教师缺乏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农村地区公办教师很少,大量是民办教师,大多是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我们将调查情况向委员长会议汇报,并把拍摄到的孩子们在简陋的教室中趴在地上上课的照片送给委员长看。彭真看了,唏嘘不已,他深感落实义务教育法的任务十分艰巨。他提出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协同国家教委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抓好义务教育法的落实。要以县为单位,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制定实施规划。要在普及好小学教育的基础上,根据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初中教育;切勿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的虚假普及,彭真并提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每年都要开展一次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大检查,促使义务教育扎扎实实地健康发展。

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加强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当时师范教育非常薄弱,各地只重视重点中学的建设,不大重视师范教育,许多师范学校办学条件比重点中学差得

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不少常务委员指出，实施义务教育的关键是培养和提供足够的合格的师资队伍，因而提出“国家应增拨专项经费用于加强师范教育的议案”，要求国家划拨 15 亿专款。这个议案得到了广大常委的支持，有 54 位常委在议案上签名。彭真看到这个议案后，认为提出的问题是迫切需要的、是十分合理的。他让王任重副委员长给国务院总理打电话，请加以考虑。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说，国家财政预算比较紧张，增拨 15 亿专款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办？如果将议案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那一定会通过，这样等于强加于国务院，形成了僵局不好。如果撤消这个议案，这么多人大常委提出的合理议案竟不能成立，这是违背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程序的。彭真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让我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林召集提案人开会商量，提出暂且缓议的意见，得到提案人同意，这就给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周转时间。会后彭真仍让王任重和财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波继续与国务院领导商讨解决办法。彭真还亲自出马找赵紫阳商谈，说明这个议案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为了使国家通过的《义务教育法》不落空。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同意由国务院拨出 13 亿专款。在下一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通过了国家增拨 13 亿专款用以加强师范教育的议案。彭真在充分肯定众多常委提出这个议案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得到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同时，也给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各省市区人大常委负责同志讲明，增加教育投入不能完全依靠中央，要发挥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下一齐动手，中央带了头，地方也要拿出钱来，共同加强师范教育。在中央划出 13 亿专款的带动下，有的省按中央拨款和地方拨款一对一的比例投入。师范教育得到了加强，解决了落实义务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

彭真也十分关心改善办学条件的问题。普及教育法任务重，而钱却很少，这是他经常挂在心上的一个大问题。我国教育经十年

动乱 受到很大的破坏 办学条件很差 存在大量危房 教学设备多是一扫而空 欠账太多。随着教育的发展 旧账未还又欠新账 教育投入不足成为突出问题。一个时期教育投入的增长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随着教育的发展,入学人数的增加,每个学生的生均公用费逐年下降。教育部提出解决“一无两有”(一无是没有危房 两有是有教室、有课桌凳)有的地方采取了“三股劲拧成一股绳”的办法 解决了危房问题 即国家解决一点 群众负担一点、勤工俭学解决一点)山东省临沂地区、沂蒙山区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 群众出工打石头、修校舍 解决了“一无两有、三配套”。全国推广了山东临沂地区的经验后,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完全依靠国家很难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做到了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能因此而减少。

在 1985 年 4 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讲到:常委会听取了教育部长何东昌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当时国家教委尚未成立)委员们指出 培养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教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我们应看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步增加教育经费,做到与财政支出同步增长或者有更多的增长 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积极改革教育制度。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在审议国务院提出的国家财政预算报告时,许多代表对教育经费的增长低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有意见,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参加审议中认为,财政虽有困难,但教育经费的增长不应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随着教育的发展,入学人数的增加,生均公用费也应增加。在主席团会议上,我代表教科文卫委员会提出了修改预算报告的建议案。彭真非常重视,当即宣布暂缓通过,由王任重协同我找财政部研究修改预算的问题。王任重对我说,紫阳对提出修改预算案很有意见,说国

家财政困难情况张承先不是不知道，为何还提出这样的修改预算意见。但国务院最终还是按照人大审议意见修改了预算报告，提出教育经费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国家财政预算报告修改后人大方予以通过。这就开了国务院提出的财政预算报告经过全国人大审议修改后才能通过的先河。这就为教育经费必须实现“两个增长”奠定了法律基础。

教育经费即使实现‘两个增长’还是有很大困难。我找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波研究解决问题的出路。吴波说，根本上要从税收方面想办法解决经费来源的问题，除农业税增加教育附加费外，还要在三税（生产税、增值税、营业税）中增加教育附加费。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增加教育附加费的议案，这个议案转到国务院后，得到了同意。1986年4月28日国务院发布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提出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1%，这就使教育经费又有了一个可靠的来源。

在彭真的主持下，六届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对落实义务教育法，普及教育所采取的有力措施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国务院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部门感到人大确实发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遇到困难就找人大，希望取得人大的支持。有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唐敖庆教授，因国拨基金有两亿缺口，有些重要项目安排不下来，就找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汇报情况，要求支持加以解决。教科文卫委员会下去检查工作，发现农村合作医疗组织解体后，农民治病遇到困难，出现因病致贫的情况。全国人大就此发出简报，卫生部立即派人下去调查，研究如何恢复农村合作医疗组织问题。

总之，六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工作比较

活跃，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与彭真的重视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参加六届全国人大工作，接触到许多实际问题的处理，譬如制定矿产资源保护法 纠正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 有水快流”的错误指导方针。再如对维护人大依法履行职权，任免干部问题。我们下去视察工作，发现有的省对提请人大任命的干部没有被通过就指责人大 甚至发出“党大还是法大”“不能‘以法压党’”的错误言论。彭真维护宪法的尊严，严肃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但我们的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不能有半点的含糊。但也必须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党必须领导人民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内活动 党组织一切活动都不能违犯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在1986年4月2日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有一段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提出“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常委会在法律监督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支持和监督一些违犯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例如：在选举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不尊重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民主权利，不尊重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对依法应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由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干部，未履行法律程序就由上级机关直接任命或对外公布；任意调动经过选举产生的县、乡、镇干部 并且没有依法律程序任免 有的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对提请任命的人未予批准竟受到指责，对这些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常委会要求有关地方作出必要的处理”。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处理 使我深深感到 把人大看成“橡皮图章”的做法再也不允许发生了。六届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在彭真委员长主持下确实维护了宪法的尊严，发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

彭真的读书生活

张文健

今年 10 月 12 日是彭真诞辰 98 周年。

彭真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 岁才上私塾，因家境贫寒，时常辍学 18 岁才上小学五年级，开始正规的学习。彭真在中学期间加入共产党，成为学生领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在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只有他和毛主席没有留过洋出过国。他深感知识的重要，一辈子刻苦学习，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 70 多年刻苦的学习过程中，有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

身背书箱 以理服人

彭真 1922 年从家乡侯马埕上村到太原第一中学上学 当时这所中学办了个青年学会，在学校附近一座大庙里放着很多书，除四书五经外，也有马列主义的书，社会主义的书，还有无政府主义的书。彭真常去庙里看书，深深地被马列主义的书所吸引。他在学生中宣传学习心得，确立革命理想，同群众一起参加革命斗争。1923 年经著名共产党人高君宇、李毓棠介绍，彭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24 年晋南临汾地区的党组织办了个“新生报”和“新生社”，当时有十几个人，都有革命激情，但对革

命理论懂得并不多，思想比较混乱，有讲马克思主义的，也有讲无政府主义的，一见面就争论。1924 年学校放寒假时，太原党组织派我去那里做工作。我想，他们人多，我一个人辩论不过他们怎么办？于是，我去时带了一箱子书，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社会主义的书，也有无政府主义的书，还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书，等等。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一到那里他们就要同我争论。我说：我是来看望大家的，是来和大家共同讨论社会前途问题的。我们先不要争论，我带了一箱子书，有各种社会主义的书，请大家先看一看，比较一下，究竟哪一种社会主义好？我们共同选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一道儿走。我还强调说：我们现在选择道路，不是光为咱们几个人，是要给山西广大青年选一条出路，选错了是要负责任的。于是他们安静下来，我把书给了他们。他们看了书以后，才如梦初醒，大多数人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彭真同志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尝试，旗开得胜。他自己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使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说服教育广大爱国青年，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以后，彭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更自觉、更积极了。彭真养成了坚持读书的好习惯，和书交上了朋友，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书，有空就学，有机会就宣传，向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年宣传党的主张。彭真奉命到石家庄、北平、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在“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艰难条件下，他仍然不间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向当地的同志和老工人学习实际斗争经验。1929 年 6 月，彭真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组建党支部，组织难友学习马列主义，同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

进入边区 开创新局

彭真于 1935 年夏天出狱后 继续在天津、北平、唐山、太原等地从事地下斗争。他托人买到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 如获珍宝 随身携带 认真钻研。1938 年春天 彭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北方局代表名义进入晋察冀边区，协助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及平津地区党的工作。9 月彭真担任中共北方局委员兼晋察冀分局书记。他来到晋察冀边区时，同志们看见他箱子里有那么多的好书都羡慕不已。

这次工作调动 彭真从“地下”来到了“地上”。在新的环境 新的工作中，他更加抓紧学习马列著作和党中央的指示，决心把自己学到的理论 联系根据地的实际 把工作做得更好 创造新的局面。他经常下部队 到农村 调查研究 总结经验 把实践经验经过分析综合 上升为指导思想 经过党委讨论 形成政策 再经过群众路线的方法贯彻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在党中央和分局党委的领导下，晋察冀成为抗日的模范根据地。彭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察冀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1941 年 6 月至 8 月，他在延安分七次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晋察冀边区工作。中共中央逐次将汇报要点批转各根据地党委。彭真的汇报后来整理成《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一书 毛泽东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并推荐给大家学习。彭真这次向中央汇报工作后被留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毛泽东兼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 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取经 心得真谛

在延安期间 彭真读的书更多了 学习条件也更好了 他能经常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结识了大批从全国各地汇集延安的党的高级干部和参加长征的高级将领，使他更多地知道了革命的全局，知道了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是毛泽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他回忆说 在延安我读毛主席的书最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 我都看过好多遍。我主要是看毛主席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看毛主席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他回忆说：在延安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时，是经过政治局多次会议讨论的。当初有同志提议用“毛泽东主义”命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后来在杨家岭开政治局会议时大家说，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叫做毛泽东思想，这时毛主席说，如果说这个思想一定要用一个人的名字作代表 我可以接受 但是 必须说明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很多同志正确意见的结晶，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从那以后，毛泽东思想成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彭真在延安期间 作过许多重要讲话 写过许多重要文章 他总是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解决问题，并一再强调，毛主席给中央党校制定的校训 就是“实事求是 不尚空谈”，八个大字。

彭真 1942年 5 月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署名文章《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实质》中指出：“究竟怎样才算领会贯通了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呢？有什么标准呢？显然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实际运用”。并说读书和看文件一样 要“逐件逐件地精读，

深入地研究 热烈地讨论 反复地深思熟虑地、细心地体会 才能真正领会贯通和实际运用”。1944 年 7 月，彭真在中央党校整风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一个意见对不对 要以实际来检查 这是我们共同的标准。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站在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群众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又是客观的、全面的 即辩证唯物主义的 那么我们大会许多争论的问题 就容易解决了”。很明显 彭真在延安时期的理论学习，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945 年春夏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 彭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进入党的最高决策机构。

肩负重任 学习治国

新中国成立后 彭真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中央的几项领导职务。他经常在北京、到外地进行调查研究。每逢离京外出时 他总要带上必需的书籍、中央有关文件等。有一段时间 还是用解放前的老办法，把衣物和书籍混放在一个箱子里。后来书越带越多，主要是增加了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方面的书，就专门用一个皮箱装书。他的老警卫员李志玉看到用老办法带书，已难以满足首长的需要了，就找木工师傅商量，做成一个木质的便携式书架，平放着像一只大箱子，打开立起来，就是一个小书架，虽然搬动时比较重 使用起来却很方便。这个书箱 彭真用了很多年 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

彭真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他说 要改造老北京 建设新北京 都要从调查研究入手 摸清老北京的底数 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他经常到工厂、农村调查了解情况，向教育界、艺术界、卫生界和广大市民征求意见 改进工作。他要解决北京